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 平等与偏倚性

[美] 托马斯·内格尔 著

谭安奎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 平等与偏倚性

[美] 托马斯·内格尔 著  
谭安奎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等与偏倚性/(美)内格尔著;谭安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2059-3

I. ①平… II. ①内… ②谭…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720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平等与偏倚性

〔美〕托马斯·内格尔 著

谭安奎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059-3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24.00 元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First Edition)**

Copyright © 1991 by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1.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吴 彦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涛 田飞龙 孙国东 李燕涛 邱立波

吴冠军 张 龔 杨天江 周保松 周国兴

泮伟江 章永乐 黄 涛 葛四友 姚 远

## 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 总 序

政治一直以来都与人自身的存在息息相关。在古典时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人们对于人类生活的原初体验中,政治都占据着核心位置。政治生活被看成是一种最高的生活或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最该去追求的生活。政治与个人的正当生活(古希腊)或人自身的修养(中国)是贯通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逐渐明白在由诸多人构成的共同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对待自身和对待他人。

在过往这十多年内,国人一直在谈论“政治成熟”。这在某种意义上根源于对过去几十年内人们抱持的基本政治理想的省思。但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在根本意义上不在于它在力量上的强大甚或对现实处境的敏锐意识,而在于它可以给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只有在人们不仅认识到残酷的人类现实,而且认识到我们可以根据一种正当的、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现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政治上”变得“成熟”。

这一克服和摆脱野蛮状态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开始逐渐运用他自身的理智去辨识什么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该去追求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一种政治启蒙的态度就尤为重要,无论是古典路向的政治哲学,还是以自

由民主制国家为典范的现代政治思想都必须首先予以检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此套丛书的基本旨趣之所在。希望通过译介一些基本的政治和法律著作而使国人能够在一个更为开阔和更为基本的视域内思考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吴彦

2014 年寒冬

献给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他改变了这一主题的研究状况



# 目 录

|                    |     |
|--------------------|-----|
| 致谢 .....           | 1   |
| 第一章 导论 .....       | 3   |
| 第二章 两种立场 .....     | 11  |
| 第三章 乌托邦主义问题 .....  | 23  |
| 第四章 正当性与全体一致 ..... | 36  |
| 第五章 康德的检验 .....    | 45  |
| 第六章 道德分工 .....     | 59  |
| 第七章 平等主义 .....     | 69  |
| 第八章 收敛问题 .....     | 82  |
| 第九章 结构问题 .....     | 94  |
| 第十章 平等与动机 .....    | 106 |
| 第十一章 选项 .....      | 132 |
| 第十二章 不平等 .....     | 142 |
| 第十三章 权利 .....      | 152 |
| 第十四章 宽容 .....      | 168 |
| 第十五章 局限性:世界 .....  | 185 |
| 参考文献 .....         | 196 |
| 索引 .....           | 200 |

## 致 谢

本书写于 1987 年到 1990 年之间,我想感谢纽约大学法学院德·阿戈斯蒂诺(Filomen D' Agostino)与格林伯格(Max E. Greenberg)教员研究基金在那一期间所给予的慷慨支持。书中的某些内容于 1989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塔尔海默(Thalheimer)讲座”中讲过,而大部分内容则于 1990 年在牛津大学的“洛克(John Locke)讲座”中作过报告。第 3 章的一个早期版本以“什么使得一种政治理论具有乌托邦色彩?”(What Makes a Political Theory Utopian?)为名刊于《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1989 年第 56 卷),而第 14 章则部分源于“道德冲突与政治正当性”(Mor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一文[《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1987 年第 16 卷]。

本书既是与一群朋友和同事们对道德与政治理论所进行的持续讨论的结果,也是对该讨论的贡献。在本书的推进过程中,我逐步在法律、哲学与政治理论讨论会上将其展示出来,这个讨论会是由德沃金(Ronald Dworkin)、里查兹(David Richards)、塞杰(Lawrence Sager)和我自己每年秋季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共同操办的;我从那些同事和其他例行参与者们的反应中获益良多,尤其是卡姆(Frances Myrna Kamm)。在那些年中,我曾以交谈与文字的

形式与斯坎伦(T. M. Scanlon)、帕菲特(Derek Parfit)和罗尔斯(John Rawls)就这些主题进行过讨论,他们每一个人对我的思想都有重要而显见的影响。就罗尔斯而论,那种影响现在延伸到我的绝大部分生活之中——时间可以从我作为他在康奈尔大学开设的哲学导论课上的学生开始算起,那门课的教材之一是霍布斯的《论公民》(*De Cive*)。

当我于1990年春作“洛克讲座”时,我也十足幸运地作为访问研究员在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度过了两个学期,那时候牛津有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联合会,我得以同科恩(G. A. Cohen)、德沃金、帕菲特、斯坎伦、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交谈,我参与了每周进行的对于我们研究进展的讨论。我们都在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我写作本书的最后一稿时,那些讨论极富裨益。

托马斯·内格尔  
1991年1月于纽约

## 第一章 导论

这部短论所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政治理论的中心问题。我<sup>3</sup>将努力说明这个问题是什么,以及为何要获得一个解决办法是如此困难,而不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对于这种结果无须有悲观的想法,因为对严峻障碍的承认往往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且我相信,我们尚可期待,政治与社会制度将来可以在不忽视人性之顽劣现实的情况下得到发展,它们会继续推动我们迈向道德平等的并不平稳的进展。

我的信念并不仅仅在于,迄今为止所设计的全部社会与政治安排都不令人满意。那可能要归因于所有实际的制度在实现一种理想方面的失败,而这种理想乃是我们都应该当作正确的东西予以承认的。但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不仅是实践上的,而且也是理论上的:出于道德与政治哲学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们尚未拥有一种可以接受的政治理想。那个未解决的问题是人们所熟悉的,即在集体的立场与个体的立场之间进行调和。但我并不想首先把它作为一个关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是在本质和根源上将其当作关于每一个个体与其自身之间关系的问题来处理。这反映了一种信念,即伦理学,以及政治理论的伦理基础,必须被理解为源于每一个个体当中的两种立场之间的分离,这两种立场分别

是个人性的(personal)与非个人性的(impersonal)。后者代表集体的种种要求并赋予它们在每一个个体面前的影响力。如果没有  
4 这种立场,就不会有道德,而只有个体视角之间的冲突、妥协和偶然的收敛。正是因为一个人并不只是占据他自己的观点(point of view),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私人的与公共的道德而对他人的要求保持敏感。

支配个人之间或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任何社会安排,都依系于自我内部力量的相应平衡——也就是自我的微观图像。那一图像对每一个个体来讲,都是个人的与非个人的立场之间的关系,社会安排依系于这种关系并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如果一种安排试图要求得到生活于其下的人们支持——换言之,如果它要声称正当性(legitimacy)的话——那么,它必须依赖于或创造出他们自然而然分裂的自我之种种要素的某种合乎情理的(reasonable)整合。这种划分尚失之粗糙,而且忽略了大量的内部复杂性,但我相信在思考这一主题时它是必不可少的。

政治理论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个体内部的冲突,而且任何不从源头上处理这些问题的外部解决方案都是不充分的。我将声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的非个人立场形成了一种对普遍的无偏倚性和平等的强有力的要求,而个人性的立场则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动机和要求,它们对无偏倚性与平等这类理想的追求与实现造成了障碍。承认人人都是如此,这就给非个人的立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即要以平等的关切来对待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要求,而这反过来给个人带来了进一步的冲突。

同样的问题在个人行为的道德问题上也会出现,但我将论证,

对它们的处理必须被扩展到政治理论,而在政治理论中,政治制度与个人动机之间的相互支持或冲突关系至关重要。要实现一种可接受的政治理想与可接受的个人道德标准之间的珠联璧合,这似乎相当困难。因此,提出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这样的:当我们试图发现关于个人行为的合乎情理的道德标准,并试图将其与评  
5  
价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公平标准相整合时,似乎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它们回应着对立的压力,而正是这些压力使得它们分裂开来。

在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上,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辩护试图把非个人立场的要求外部化。但它们必须由个体——非个人的立场正是为了他们而与个人性的立场共存的——来充实、支持并赋之以生命力,这一点必须在它们的设计中反映出来。我的观点是,设计出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同等重要性而又不对个体提出不可接受的要求的制度,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又是因为,对我们的世界而言,每一个个体内部个人的与非个人的立场之间的恰当关系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绝大多数人经过反思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它充斥着精神上令人不齿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它迈向承认宽容、个人自由与人类发展的共同标准的进展一直缓慢和不稳定得令人沮丧。有时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改善,而对于所有那些因为领教了本世纪\*的主导性事件而养成了一种对于人类前景的防御性悲观情绪的人,比如我自己,东欧新近发生的事件必定让

---

\* 此书出版于1991年,因此,所谓“本世纪”,指的是20世纪。——译者

他们踌躇起来。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共同生活。数以百万计的文明人在一场核子战争中相互残杀的公然意愿现在似乎正在衰退,因为刺激这种意愿的政治信念的冲突失去了它们的尖锐性。但即便在发达世界,更不用说在整个世界了,导致了民主资本主义和威权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政治与道德裂痕的种种问题,却并未由后者在竞争上的彻底失败而得到解决。

集体主义可能在欧洲已经败落,我们也许还可以活着庆祝它在亚洲的式微,但那并不意味着民主资本主义在人类的社会安排<sup>6</sup>方面就是最终的不二法门。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记住这样一点是值得的,即集体主义的存在部分地归因于一种平等的理想,而无论假借其名而犯下的罪恶和所导致的经济灾难有多么巨大,它仍然深具吸引力。民主社会尚未找到应对那一理想的方式:对老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它是一个问题,而对于东欧继集体主义的垮台而正在形成中的民主国家来说,它也将会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甚至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是这样。政治哲学不会改变这种情势,但它也有它的作用,因为政治生活的一些明显是实践性的问题有着理论上和道德上的根源。道德信念推动政治选择,而道德一致性如果严重缺乏的话,可能比一种单纯的利益冲突更具有分裂性。任何倾向于怀疑政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的人,面对正在上演的事件都无法坚定自持:道德与理论之战正在全球范围内打响,有时甚至是真枪实弹。

人们应当把政治理论设想为一种发现的事业——即对人类可能性的发现,这些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则得到这种发现本身的鼓励和帮助。大多数政治理论的传统理论家们显然正是以那种方式看

待它的。他们从事着想象道德未来的事业,心中抱持着助其实现的希望。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乌托邦主义的风险,而那个问题是我们的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种理论,如果它描绘了一种集体生活的形式,人类或大多数人都不能过那种生活,而且通过任何可行的社会与精神发展过程也没法过这种生活,那么它就在贬义上是乌托邦的。作为对少数人的一种可能性,或者作为一种对其他人的可敬而不可即的理想,它可能有其价值。但是,它不能被当作对政治理论的主要问题的一个一般性解决方案而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

尤为糟糕的是,当所描绘的东西事实上不具有动机上的可能性,而关于其可能性的幻象却驱动人们无论如何试图去把它建立起来,并导致种种极为不同的结果。社会常常试图按某种模型来<sup>7</sup>塑造人们,因为他们愚顽不化,不能顺应某种预设的人类可能性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理论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其假说受制于未来,其实验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sup>①</sup>

但是,虽然避免乌托邦主义很重要,其重要性也不甚于避免它的冤家,即顽固的现实主义。固然,一种提出新的可能性的理论必须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些可能性纯粹是想象的。人类与人类动机的真实本性必须总是要成为这一主题的本质部分:悲观总是确当的,而且我们已经被给予充分的理由惧怕人性。但我们不应当

---

<sup>①</sup> 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过的那样:“确实,你不打破鸡蛋你就做不成一个蛋卷儿;但你可能打破了大量的鸡蛋却没做出一个蛋卷儿来。”



过于受缚于源自实际动机之卑劣的局限性或对人类改善之可能性的过分悲观。即使在我们已经接近于实现已然可利用的最佳观念之前，努力设想下一步也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工作中，对道德直觉的运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不当为之抱憾。要信任我们的直觉，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什么会是正确的东西的情况下告诉我们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的那些直觉，我们只需相信，我们的道德理解力较之于我们说明支持它的原则的能力而言延伸得更远。直觉可能被习俗、自我利益，或对一种理论的信奉所腐化，但它并不必然如此，而且一个人的直觉常常给他提供证据，表明他自己的道德理论正在缺失某种东西，或者他因其所受的教育而发现它们是如此自然的种种安排其实是非正义的。直觉性的不满是政治理论中的一种基本资源。它能告诉我们某个地方出了问题，但却不必然告诉我们如何去确定问题究竟在哪里。甚至对当前政治实践中最理想的形式来说，它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回应，而且我相信在理论层次上它也是正确的回应：毫不奇怪，它告诉我们，我们尚未达到真理之域。它能够以那一方式帮助我们培养一种对熟悉事物的合理的不满，而又不至于堕入没有批判性的乌托邦主义之中。

我相信，在以这种方式所揭示的最紧迫的问题当中，个人的与非个人的立场之间的冲突是其中之一。如果通过道德理论与制度设计，我们不能在对每一个人的不偏不倚的关切与每一个个体如何能够有理由被期待去生活的观念之间进行调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为任何政治秩序的普遍可接受性进行申辩。这些关于整合的问题与我们的人性相伴而生，我们不能期待它们会消失。但对